

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

——以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为例

隋 艺 陈绍军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生态移民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落基于生存理性的考虑而做出搬迁的决定;落地生根后,移民们通过开展以经济理性为主的活动,走上了生计恢复的道路;同时,移民作为新居住地的“外来者”,需要融入当地的社区。这是一个从搬迁到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体现出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过渡。

关键词:生态移民;理性选择;原因分析;生态性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6)01-0077-05

DOI:10.15899/j.cnki.1005-5681.2016.01.014

Behavior Choice of Ecomigration and Its Evolution

—A Case of a Ecomigration Village in the City of Delingha in Qinghai

SUI Yi CHEN Shao-jun

Abstract:There are emerging researches on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rational behavior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migrants and explores the deep causes that trigger the changes of their behaviors. This thesis contain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ly, what are the rational behaviors of environmental migrants along the process of relocation, transition, and resettlement? Secondly, what factors would influence the decisions of migrants? Thirdly, what are the deep reasons behind the decisions? At last,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in this reg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from a vicious cycle of man and nature to a virtuous cycle. Ecological migration is a means of alleviation of poverty, popul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Rational Behavior; Factor Analysis; Ecological Features

从三江源生态移民到龙羊峡、公伯峡等水库移民看,青海省无疑是一个移民群体和类型众多的省份。本文中的研究群体,位于青海省海西地区,是以改善环境与扶贫相结合的生态移民。在社会变迁这个大背景下,伴随着移民群体的迁移及定居,其适应性、融合情况、各种观念都发生了较大转变,移民的生活也逐渐从生计恢复走向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通过深入的调查,笔者发现此部分移民群体在迁移及发展的过程中,从以生存为主到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追求,体现了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三种理性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同时,这种转变过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和限制时,移民又是如何进行选择的?移民这些行为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在移民行为选择的不同阶段,生态移民同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生态移民的特性又是如何体现的?这些都是本文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一、生存理性下的搬迁与异地新生

(一)时机促使下的搬迁

L村移民原来都居住在青海省海东湟源县城,属于城郊乡。境内部分地区干旱缺水人畜饮水极为困难。即便有水源,但水质不良,严重缺碘、缺钾,长期饮用,会造成地方病,且发病率很高。而移民迁入地是有中国“四大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的青海省海西州,有丰富的各种资源,为海西州乃至青海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优势资源。

由于原居住地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以及面临生活贫困的窘境,移民们逐渐开始了迁移活动,需要注意的是,迁移不应该单纯看做是离开一个地方,是到另一个地方持久定居下去的行为。1987年到1988年期间,在整个农垦企业面临改制的背景下,海西州农垦公社劳改农场也进行改制。青海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召集海东八县的农民(湟源、湟中、大通、乐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以四川省凉山州生态移民村为例》阶段性成果,批准号:82001670。

收稿日期:2015-10-27

作者简介:隋艺(1985-),女,青海西宁人,西南民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移民社会学研究。

陈绍军(1965-),女,安徽人,河海大学移民研究中心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移民社会学、工程社会学研究。

都、循化等)至海西德令哈农场、八银湖农场、塔拉农场、尕海农场种地。农垦局的文件里注明:搬迁至此,会给移民们盖新房,解决户口问题,可以贷款,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但在后续的实际落实的过程中,许多条件并没有落实。

移民来到新的环境中,丧失了生产资源、社会资源,加上陌生的环境,首要解决的便是生产生活恢复问题。移民在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恢复遭遇搬迁安置带来的损耗、陌生环境的制约和自身条件缺陷方面的困境,还要面对当地异样眼光,对其都是考验。同时也面临着新居住地生产生活众多的机遇,因此这既是一个生产生活、克服苦难的过程,亦是把握机遇的过程。

(二)异地重生与生存理性

此移民村位于海西州德令哈市尕海镇的东北部,于2003年11月份由尕海农场整体移交给尕海镇政府,属于新成立的移民村。该村现有3个社、310户、1400人,其中,少数民族(主要以回族、土族为主)429人,占全村总人口的30.6%,属于少数民族聚居的移民村落。村民祖籍为青海湟中、湟源、大通、互助、循化、化隆等地区。这样的特殊的背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视角。

起初的三年,属于荒地的恢复期,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农场。三年以后,麦子长势好,农场要求上交的粮食数量每年呈20%的趋势增长,移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移民们本以为迁移至此能够改变原来的生活状态,但是农场对移民的要求越来越高,长期以来移民的身份得不到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算是稳定下来了,但是强烈的劳作负担,以及身份的尴尬性,各种标准与移民预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引起了移民的强烈不满。到了2002年底,青海省大才旦地区发生了6.7级的地震,附近的塔拉农场损失惨重,房屋倒塌现象异常严重,随后经青海省常委会决定,海西州所属的五个监狱农场一致进行改制,将五个农场改制成五个股份公司,农场的土地按工龄分,对农场移民进行统一安置,移民的户口问题终得以解决。

(三)移民的生存理性

人们追求生存第一,以追求生存需要为目的就是生存理性。“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而不是追求效益的合理化和利益的最大化。”^[1]移民最初从事的搬迁行为,就是因为原居住地不能满足其生存条件,为了生存他们选择了搬迁。到新居住地后,通过上访的渠道获得身份,成为居民,享受优惠的政策和项目,改变其生活窘境。

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移民搬迁最根本的动因。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以及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方面的压力,都属于生存压力。人地关系的紧张属于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即在现实的技术水平和相关的生产经营条件下,生产资源不能满足维持移民生存的需要。移民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谋求生存,充分体现了生存理性选择。移民在资源环境的窘境下,“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不是其追求的。这是一个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的问题,“生存理性选择”是“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有效的反应。

在这个阶段,生态移民同环境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并不能利用自然资源,相反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使其陷入了贫困。他们只能选择搬迁到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才能继续生活下去。当然,在原居住地改善环境也是一种方法,但要面临的问题繁多。所以,搬迁虽有风险,但也是对新生活的一

种向往,以及被迫的作出的对环境不满的一种“反抗”。

二、落地生根过程中的生计恢复

(一)移民村整体恢复情况

成为了村民后,移民们才享受到了各项优惠的政策。但是由于其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态,从生计恢复到快速发展也并非易事。2006年,随着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落实,村成立了蔬菜协会。首批大棚于2007年9月建成,共50座,随后便投入生产。主要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如高原瓜、杏、冬枣、辣椒、西红柿、黄瓜等时令果蔬。此村所处地理位置属于属高原大陆性气候,是典型的荒漠、半荒漠地区,日照充足,干旱少雨,冬寒夏凉,非常适合水果的生长。2011年每座大棚年纯收入可达1万元。在土地流转的新形势下,近几年,种植枸杞也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2007年村里享受到了退耕还林的项目,村里的国有土地,市林业局把这块地承包给给了宁夏商人,让他们在这里种枸杞,收成很不错。村长和书记看到了效益,且掌握了种枸杞需要的技术、方法,今年村里一共种植5000多亩枸杞。

当然,除了以上的大棚和枸杞项目,移民们必选的方式还包括外出务工,其包括建筑,运输,修车等在内,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从中可以看出,此村移民的生计恢复及发展是在其身份得到证实以后,在优惠的政策支持下,抓住了机遇。我们知道,行动者个体及其行动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单位,行动者是在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的人。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受到社会中的价值规范和情境条件的制约。搬迁、生计恢复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持续化的过程,移民们选择任何一种方法恢复生计都可以说是一项社会行动,是具体情境下的产物。

(二)经济理性的形成及发展

如果仅从生存理性来解释,只是最初移民搬迁的动因。随着社会变迁,生存视角无法解释移民温饱(生存)之后的活动。显然,他们具有了相对于前一层次的较高的层次追求。理论上讲,在各种制度性结构条件下,作为行为主体的移民不是完全被动接受,相反,在生存理性的推动下,他们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运动,目的是为了生存。

在定居后,通过开展经济理性行为选择从而在与生活环境以及其他非移民群体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这不仅成为许多移民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成为他们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移民们经济理性选择的开展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性选择行为。从总体上看,移民开展经济理性选择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构和非移民村的村民或者市民。

经济理性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当地的生态环境为其提供的便利条件,这种便利条件和移民们的辛勤劳动结合在一起,为移民们生计恢复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是利用自然的一个方面。但是事情都是具有双面性的,过度的利用自然,使现居之地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这就使人与自然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在经济理性阶段,人们还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对生态环境无休止的利用,也为日后生态环境恶化后,移民们面临再次搬迁的窘境埋下了伏笔。

三、生计恢复后的社会融合与发展

(一)移民村的融合与发展

移民们定居后,同当地必然有一个逐步磨合的过程。尤

其是在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适应了新的环境、主人翁意识有所增强的情况下,会不自觉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同时人们也在认同观念下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此来谋求、维护一定的社会资源,促使其发展。无论从经济方面、政治与公共生活、还是文化心理等方面,在生存问题解决后,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移民们会在社会理性的层面上投入一定的关注度,人们开展理性选择行为的动因是使自身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其目的是获取最大化的社会利益,因此人们在开展社会理性选择行为时遵循的是满意原则。

社会融入的维度有很多,例如经济融入、行为适应、心理认同等。移民的社会融入则包括定居后的经济适应、社会生活上的适应和当地社会对移民的接纳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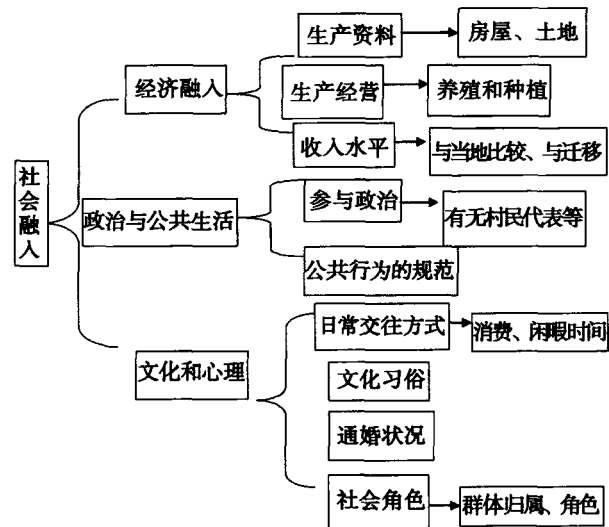


图1 移民村社会融入维度图

首先,经济生活的融入对于移民来说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内容,移民们的生产经营状况,是其生计之本。如房屋,在2004年身份得到认可后,都已经解决。而尕海镇果蔬种植基地也是以此村移民为主体进行培育的。此基地种植的油桃、西瓜、草莓等“新”、“特”、“绿”瓜果及辣椒、西红柿、黄瓜等各类蔬菜,经济收入达200万元以上。通过“合作社+农户+基地”和“公司+农户+基地”的模式,有力地带动了周边105户移民,促使每户移民每年增收9000元,解决了剩余劳动的就业问题,成为当地移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众所周知,通婚是安置地区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策略之一。调查发现,移民中已经有一部分青年与当地居民子女通婚。在形式上,除了女方嫁到男方,也有移民男青年入赘到当地居民家中,组建家庭。移民们普遍感觉,现在提倡“婚姻自由”、“年青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的风俗与生存习惯。”

在角色认同方面,虽然移民们已经在此安置落户20年,但无论从当地居民还是移民本身,并没有实现从“移民”到“村民”的转换。首先,在称谓上,仍会称或者被称为“移民”;其次,希望得到特殊的照顾。他们对本群体的归属感较强,在移民内部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上可以看出,移民已经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二)社会理性的形成及发展

社会理性,是基于社会学对经济理性的修正和发展而提

出的,强调人是追求自我的满足和效益最大化,并按照增加满足的方式行动。“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2]

更具多样化是社会理性选择的特点,使移民在生计恢复方式过程中寻找的只是“满意”和“合理”的标准。而这种“满意”和“合理”常常是不确定的,它与资源价值、个人实力、以及对资源信息的控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理性行为的表现往往是多元化的,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社会及其他效益也是追求的另一个方面,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众多不同的因素权衡之中行动者只能试图寻找一个满意解,这就表明,在实际生活中很难达到最优。因此,“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

从生存理性选择来剖析,这只是移民搬迁的最初的、最浅显的、根本行原因。在社会变迁这个大背景下,移民群体寻求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不单单是为了生存。显然,社会理性的出现及发展是移民群体更高层次的追求。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制度性结构性条件下,中国农民作的行为主体可以主动的做出选择。

当移民们融入当地的生活后,得益于生态环境,他们走上了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现在,对现居住地的感情也变得深厚,面临着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他们的环保意识萌发,环保意愿加强。他们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破坏,这样生态移民搬迁的初衷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效果。只有当移民环保意识的萌发,参与环保行动的意愿增强,这种主动情况下,进入了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的过程。

四、移民理性选择行为的演化

移民选择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与过程,存在着差异性、变化性。这种差异与变化源于其动机和观念的差异与变化,且表现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的差异与变化。

移民行为的演化过程呈现出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再到社会理性的变化。首先,在生存压力下,移民主要考虑的是生存,表现为生存第一,各种选择都表现为追求生存的功能。生存理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为目标;另一方面在生存压力下,移民的选择行为受到生存压力的影响,生存理性决定了一切以生存为核心。为了缓解生存压力,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时,为获得生存所需的食物,而表现出的一种生存理性行为。^[3]其次,伴随着搬迁以及中国社会的急速的变迁,经济意识越来越强,当基本生存得到满足后,相关的对于经济和社会利益的需求感逐渐提升,当移民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时,对利益的追求就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经济价值的刺激是直观的,这时候,移民们呈现出对经济理性的选择与追求。正如科尔曼所说:“满足生存需求的条件很低,随着时间的发展,事件过程与行动创造了完整的位于上层结构的利益,只要这些利益可以使最重要的需求得到满足,对于这些利益的追求便会自发出现。”^[4]再次,移民落户后,也就是从生计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最初的融合程度较差,受到了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性加强、融合度提升的前提下,对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也出现了追求,这就是社会理性。移民在落户前,与非移

民享受的社会福利、社会公共资源差距明显。改变的突破口就是落户和移民身份的转换。

这种选择性虽然表现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差异与变化,但这三种理性并不是互不相干或者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转化的。第一,追求目标是复合性决定了在某一阶段,移民们的选择呈现出既追求生存目标、又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社会效益等。只是此阶段的侧重点不同。第二,移民对目标追求的变化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在不同的阶段、又或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等情况下,移民会综合考虑这些条件和约束因素,对目标的追求有所改变。第三,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关系看,层次上有明显的区别和联系。物质条件是基础,物质条件解决后或者达到稳定后,将会对生活质量有更高层次追求。

同时,在当前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移民行为的演化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方面,移民行为选择的差异和变化是理性追求和选择的结果。在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等不同的理性追求下,移民表现出生计恢复方式的不同偏好,做出的不同选择。另一方面,移民选择行为的差异和变化是实践中行为和结构相互建构的结果。在实践中,他们的理性行为受到各种具体情境等结构性因素的约束和制约,在这种约束下,他们会随具体情境的变化而调适目标和行为。

五、生态移民与其行为选择

人类在迁移的过程中,是同自然调和的一个过程,伴随着迁移,原居住地和现居住地的生态环境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生态移民的出现及壮大,可以说是整体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移民的出现及发展,受到生态环境和生态移民自身的影响。这个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就此部分生态移民的具体情况而言,首先,从自然环境的变迁来看: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毫无疑问对生态环境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同时,历史上青海省进行过4次较大规模的开发,基本以屯田开荒为主,取得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快文明进程,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自然生物链被弄得支离破碎,为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所以,总体的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其次,生态移民由于其独特的特性,在移民行为选择演化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同其他移民不同的特征,换句话说,也就是移民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化。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不同情况分析这种关系。

人们的迁移活动必将伴随着迁出和迁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口的减少,人多地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原居住地生态环境脆弱,居住条件恶劣,在移民离开后,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本身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或者提高,原居住地居住的农民还是处于贫困的状态。

迁入地是生态移民的出口问题,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的移民迁入地,便无法实施生态移民。选择迁入地有两个方向:一是城镇,二是农业区。就像此部分移民,迁入地的足够的质量好的耕地,身份确认后的土地政策,也保证了移民们稳定的生产资料,使生态移民能够安心。

所不同的是,现居住地随着人口的增多,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移民们在以生存为

前提的情况下,并没有了解、更谈不上融入当地的文化,这样就不能够汲取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智慧,那么,如像生态移民这些生态工程便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移民群体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见效甚微,有时候还会起到阻碍的作用。这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而违背了生态移民迁移的初衷。

随着居住年限的延长,移民们的生活得到了好转,从适应逐渐走向了融入当地的过程。一方面,移民们把现居住地当成了自己的家,希望自己的家园能够建设的更好,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也能使现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很早就从当地人对其自身环境的理解中所获得的知识证明,保护环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护当地传统文化的存续。移民们解决生活问题后,进入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他们会通过自身的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识,运用他们的智慧,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就如移民的选择行为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过渡一样,移民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也是伴随着这个过程从萌发、扩大、支持到实际行动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只有在解决生存问题,并且达到同当地生活的一定程度的融入之后,保护生态环境才会更为可行。从而进入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的过程。

六、移民行为选择因素分析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部因素对于推动集体行动有着重要作用,接下来,将分别从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来分析移民行为选择的不同因素,剖析各种因素背景下对移民行为选择的影响。

生态移民所进行的活动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相关政策包括国家以及地方的政策。项目扶持是扶持中的另一措施,简单说来,就是对不能核定到户到人的移民进行项目扶持,主要开展基础设施项目、生产开发项目、科技推广项目和其他项目等。^[9]项目的大力扶持,使移民群体对申报的申报呈现出极大的热情,并有“妖魔化”的趋势。当然,政府职能以及相关的治理方式的演变,可以从项目中看出来的,这触及到国家、相关地方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之间的关系及其建构模式,还涉及国家与基层相结合的视角,特别涉及到国家、地方和基层的多重运作机制和行动逻辑如何进行博弈等关键性的议题。^[9]

生态移民的行为选择除了受到宏观方面的如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影响等,行动者的主体,生态移民的自身也对其自身的选择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

个人选择偏好是指行动者如何看待他的已经得到和将要获得的东西,这决定行动者需要什么。^[10]偏好是怎样形成的呢?有一些欲求诚然是先天具有的,但转化为需要,却要受到后天习得的知识的影响,这些知识决定了行动者对可满足欲求的事物的认知,从而决定了他满足欲求的可能范围,以及更偏好哪种可能;这种知识体系也包括行动者的价值观念,这也影响着行动者的偏好。

从移民们迁移的动机可以看出,“寻求生存”是最适合当时移民们迁移的心态。当移民们的身份得到认可后,开始享受到各种优惠的政策,得到国家的扶持,生计恢复是一个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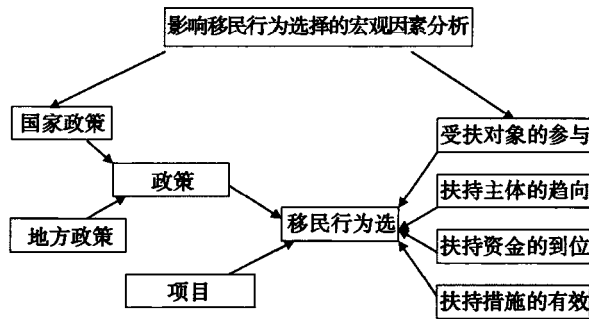


图2 影响移民行为选择因素的宏观因素分析

对较长的过程。在生存得以满足的条件下,个人选择偏好发生了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农民以“维持原状”、“避免风险”为偏好,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利润”。而个人选择偏好的改变离不开特定的情境,其次,这种变化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持续性是指这种变化并不是偶发或间断的。是行为内在的最为本质的真实的体现。

其次,移民所做出的选择行为,都和家庭未来的发展走向息息相关的,必然与家庭的各方面行为相互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成员间的关系、成员的素质等都会对其选择行为造成影响。而家庭内部能影响选择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家庭结构,家庭的功能等。移民家中男孩、女孩性别结构不同时,选择的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主要表现为男孩可以更多的接受培训,参加培训,远距离的外出务工等,女孩则在家务农或者选择附近的地方打工。不同的选择,收益也不同。

同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当行动者希望达成目的性行动时,可以动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对社会关系的投资,行动者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获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

此群体的家庭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基于移民各种社会关系而构成的资源。这种关系资源,从构成内容上看,主要包括财富、权力和声誉。从数量上看,包括关系网络的规模大小,网络拥有的资本容量的多少。从现实来看,移民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是基于熟人、亲属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以亲缘、地缘为依附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对移民选择行为的影响,既体现在观念上,也体现在目标上。其中,家庭社会资本对移民的选择行为既有积极的影响,也存在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表现在家庭社会资本多,关系网络多,刺激移民,期望获取更多的利益。相反,消极影响则指这种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反而催生了移民“只重关系,忽视劳动”的观念。

总而言之,结构与行动的关系视角在剖析移民行为选择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将移民行为选择视为结构与行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将移民“嵌入”特定的结构中考察其行为选择的过程以及行为对结构的反作用;同时,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加入结构与行动的互动之中,考察移民生计恢复全过程的行为逻辑演化,一方面,移民行为选择是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做出的,另一方面,移民行为也会反作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网络结构。

文中的生态移民是政府主导型的、自愿性的生态移民。在移民理性选择的不同阶段,他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表现的不同。就此部分群体来说,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他们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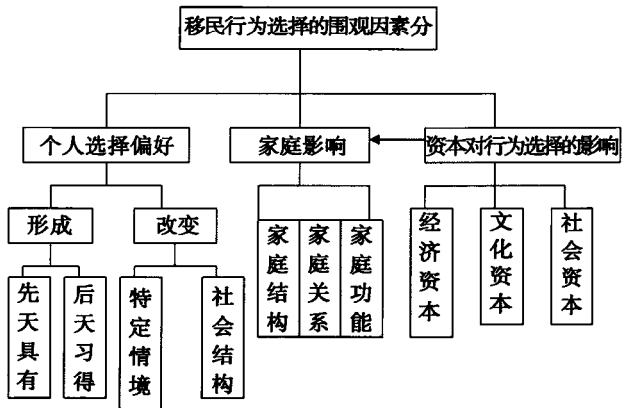


图3 影响移民行为选择因素的微观因素分析

环境、破坏环境;在融入当地生活、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中,他们环保意识萌发、环保意愿增强、并参与环保行动;从人与环境的恶性循环到人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完成了脱变的过程,体现出此群体的特性。

生态移民项目的初始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解决贫困为目的,但是政府乃至移民都忽视了对现居住地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保护了原居住地,却破坏了现居住的生态环境,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本文中的生态移民已经逐渐意识到环境对其的重要性,这种主动性的、有意识的环保意愿的萌发和意识的加强,能够更好的开展环保行动。所以,政府、生态移民都要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意识,保护现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同时,因为生态移民群体经历过生态环境的恶化,所以如果能够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对已经搬迁的生态移民进行普及,也会成为环境保护的中坚力量。

注释:

[1] 欧阳觅剑等:《社区的构成》。本文获1999年北京大学挑战杯论文评比一等奖。

参考文献:

[1] 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6).
 [2] Coleman, J. S.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15.
 [3] 黄祖军.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逻辑研究[D].上海大学,2010.
 [4]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76.
 [5] 王沛沛.富裕之路:水库移民创业支持及其行动——基于温州地区的个案研究会,2007,(5).
 [6] 折晓叶等.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4).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党措]